



## 淺談歷史學研究與自然科學之異同

蘇軒立

一次量物下課後，本育跑過來跟我提及系上《時空》需要一些稿件，談到我輔系的歷史，便問我認為歷史與物理之間是否很不一樣，我第一個反應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它們幾乎是一樣的。在我的學習經驗而言，歷史學無疑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一門人文學科，但再細細深思，研究人與人群的歷史學和研究物質的物理學，在本質上就是不同的，又如何闡述他們在諸般不同間的相似呢？以下就民國以來歷史學的發展與國族主義的建構來勾勒出兩者異中有同的特質。

### 新史學

台灣的史學研究以 1950 年為一個起點，日本政府於 1945 年退出台灣，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三年後撤退到台灣後，開始了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自大陸隨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一些新史學的第一代歷史學者，則在台灣展開了二十世紀以降的新史學研究。在當時政治的嚴苛環境下，史學研究只要不涉及政治議題，”乖乖”地固守在自己的學術領域，是國民政府尚可允許的。這一批來自大陸的歷史學者，主要集中在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並任教於台灣大學歷史系，當時史語所的所長傅斯年先生(1896-1950)同時也是台灣大學的校長。在這個時代，史語所是台灣唯一研究歷史學的地方，而台大歷史系則是唯一培養歷史學者的學院。

二十世紀的史學的「新」，主要是和清朝以前的歷史學相比較而言，新史學的理論首先由梁啟超先生提出。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兩文中，他力倡史學革命，抨

擊舊史學的種種弊端：一是只是朝廷的興衰史，不是國家的興衰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只是個人的歷史，不是國民的歷史—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是寫史不能聯繫現實；四是寫史不能探求歷史發展規律。

當時西學東漸，許多的科學研究方法逐一被納入史學的研究方法之中。將史學放入自然科學的體系之中，首位學者應屬傅斯年先生。傅斯年早期就讀於北大文學院，畢業後到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學習實驗心理學。他早年是個科學迷，相信科學方法具有普遍性，多方涉獵各種科學方法的著作，在倫敦大學三年多後，便轉赴德國研讀近代物理學，之後再轉讀梵文、藏文等東方語言。傅斯年先生雖然不是歷史科班出身，但在 1926 年回到中國後參與了一系列的史學革命與建構。隔年他成為廣州中山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同年蔣介石政府在南京成立，曾當過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先生創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曾是蔡元培在北大時的學生，乃建議他在中研院內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作為一個科學研究的中心，史語所是第一個設立在自然科學下的人文學科部門。傅斯年認為同樣的史學，若採用與之前不同的新方法，則可以成為與生態學、地質學、物理學等並駕齊驅的學科，並向蔡元培保證，如果史語所用的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學方法，那麼史語所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傅斯年的史學思想中所重視的是史料，所有的歷史理論都必須符合從史料中找出的證據，才有可信度。

傅斯年重視證據的思想，早期應是受到

胡適先生的啟發。民國二年，傅斯年考進北大預科，三年後升入文本科，下一年的秋天，年僅 27 歲的胡適任北大教授，此時傅斯年 22 歲。胡適以其新穎的治學方法和見識影響了許多學生，他的治學方法為「勤、謹、和、緩」。「勤」就是眼勤和手勤，勤求材料，勤求事實，勤求證據。「謹」就是一絲一毫不苟且，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和」是心平氣和，虛心體察，平心考察一切不合己意的事實與證據，拋開成見，跟著證據走，服從證據，捨己從人。「緩」是要從容研究，莫急於下結論，證據不足時，姑且懸而不斷。胡適並主張懷疑，對於一切主義、一切思想必須先懷疑而後可相信，必須要有充分的證據才可以相信，他常宣揚科學大家赫胥黎(Huxley)的話，我們「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科學方法和精神影響了新史學的研究方法。傅斯年推動的新史學研究，確立了第一手史料的權威性。『史學追求真相、從史料中去還原出歷史真相』，成為了史家的使命。史家所推論出的一切「事實」或理論，都要有證據的支持，並且禁得起任何考驗才能讓人信服。

## 史家與史料



然而歷史學畢竟是一門人文學科，無法做到如同科學一般的客觀。問題出在於解釋史料的史家具有主觀性。史料本身並不會說話，是史家的詮釋才使史料有了意義，因此史料的詮釋或多或少都帶有了相當的主觀性，這是第一個與自然科學絕對不同的地方所在。

在整個歷史洪流中，會留下資料的事件

只佔了一小部份。而殘存下來的史料中，流傳至今為人所挖掘出來的也只有其中一小部份。在這些為人所知的史料中，屬於第一手史料的更是少之又少。二十五史等國別史皆是經過粉飾的官方史書，真實性有待評估，況且就算是第一手史料，也不代表絕對符合事實。法官想要還原犯罪的真相，縱有許多證據仍舊是困難重重，各說各話下只會混淆真相，更何況史家想要還原已經湮滅在時間洪流中的歷史真相，可說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再則，自然科學等使用的是符號語言，與人文學科使用的自然語言亦是一個差別所在。

## 歷史作為政治的工具

許多歷史課題往往是因政治需要所做出的塑造。

日前宋楚瑜先生西訪大陸，所到達的第一站是黃帝陵，藉祭祀黃帝以呼籲兩岸同為「炎黃子孫」、「中華民族」，應一同謀求和平。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他為有熊氏的首領，大戰蚩尤統一各部落的事蹟，廣為人所知。何為中華民族？歷史課本就有提到漢、滿、蒙、回、藏等諸種族皆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這樣一個龐大的概念，將各個種族透過「血緣」的樞紐—擁有共同的祖先，黃帝一聯繫在一起的民族思想，是自何時開始的呢？清朝以前，人民只有朝代的觀念，更只有漢族的認知，排斥一切非漢族的外來政權。「民族」一詞最早出現於王韜的「洋器在用其所長」一文中，約在 1874 年左右，據考證，中國古籍中並沒有使用「民族」以形容一個人群，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時，民族一詞才廣泛出現於各報章雜誌中。

一個文化往往只有在被逼迫到邊界的時候，才會開始省思屬於自己的內涵，更需要建構出一個飄渺的過去傳說以加深其傳統和內部凝結力。在清末，異國文化挾其優勢武力嚴重威脅到清朝，晚清的知識分子必須要建構出一個屬於國家與民族的國族主義，方能用以抵抗外來的侵略，黃帝就是在這個時候被選擇出來，作為所有中國人的祖先。

周人以黃帝「居於姬水旁，以姬姓之」，因為姬姓，以他作為周人的祖先。到司馬遷撰「五帝本紀」，溯其源流，整理譜系，建構出了一套「虛構性譜系」，從此黃帝便作為遠古以來各代帝王的共同祖先。進入二十世紀，黃帝作為皇室先祖的皇統符號，開始有了急劇的轉變。各個政治團體在凝聚國人，強調彼此都為同一民族時，不約而同地使用了黃帝作為遠祖。從此，黃帝就不再是專屬一朝一姓的祖源，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中華民族的構成，深受西方種族主義的影響。1907年，海內外革命份子情緒高昂，要求變革之時，章太炎與康有為不約而同提出了要求更改國號的文章，且都以「中華」為國名，所不同者是章太炎提出的是「種族的國族主義」，康有為則是「文化的國族主義」。章太炎以漢族為主，排斥其他一切不同血緣的種族，認為西藏、蒙古等處與華人皆不同語言文化，應排除之，除非設立教育教化之，否則不應納入一國。康有為則認為一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無分漢族或滿族，沒有彼此劃分界限的必要，應當一同來抵禦外侮。他呼籲清廷，撤銷漢滿名籍，使漢、滿、蒙、回、藏同為一國之人，以「團和大群，以強中國」。

於是乎，在晚清搖搖欲墜的艱困局面下，中國的知識份子面對異文化的逼壓，開

始重新尋求本身的文化，以黃帝為一個血緣的連結符號，建構出了「華夏民族」、「中華民族」的國族主義。這樣的思想更在民國創立之際深植人心，影響至今，連結了所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

同樣的，「民族英雄鄭成功」也是因為政治需要所塑造出來的英雄化、神格化人物。而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始終把台灣視為暫時的居留地，中小學的歷史教育更只見中國史而未見台灣史，教育中忽略了人民成長的土地，這不能說不是個奇怪的現象。由於早期教育的影響，我們一直以「文化的中國」為依歸對象，但目前台灣史教育已成為主流，在這樣的影響下，「土生土長的台灣」和「文化的中國」逐漸形成矛盾。歷史教育賦予人民對自身文化與國家的定位，但當政治過於涉入教育，學術無法維持本身的超然性，混亂便於焉產生。這便是歷史與自然科學全然不同的本質所在，即為人與物的本質差異。

## 結語

作為系上的刊物，我並沒有著墨在物質科學的研究方面，因為大家早已熟悉；對歷史方面做出一些描述，對於非歷史系出身的大三學生，行文間當然有不少疏忽之處，在整個架構上也略嫌草率而不夠周密，這篇小文章請諸位看看就好。 2005.5.9

